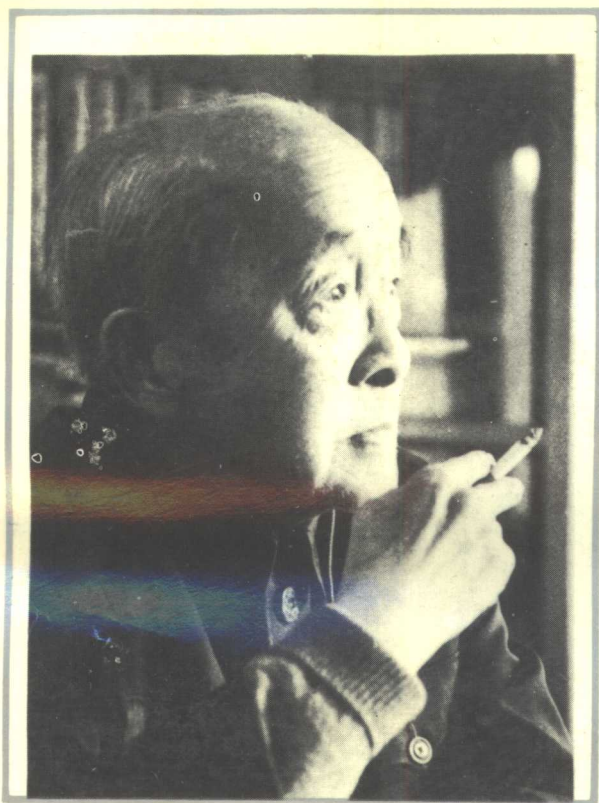




胡愈之传

朱顺佐 金普森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胡 愈 之 传

朱顺佐 金普森 编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12号

胡 愈 之 传

朱顺佐 金普森 著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2印张 8插页 307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1035-195-8/K·016

定 价: 5.60元



胡愈之与夫人沈兹九



胡愈之和老乡吴觉农



胡愈之和老友叶圣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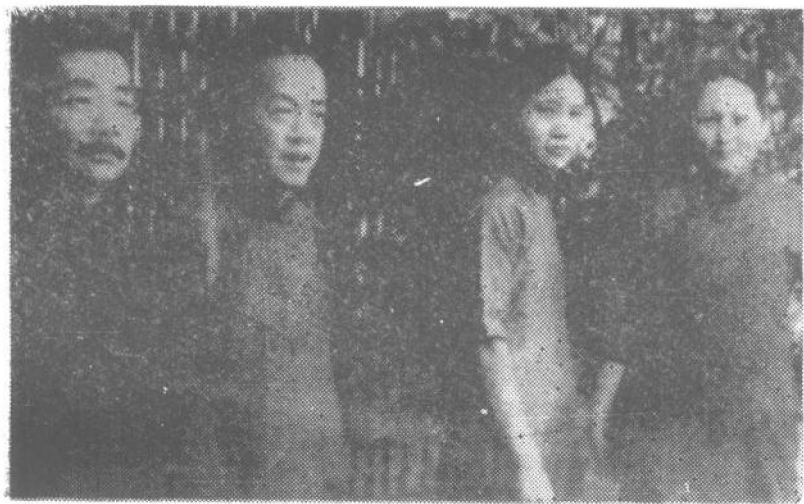
1931年胡愈之在法国



1931年，胡愈之在德国柏林《国际主义者》报（世界语）编辑部。



胡愈之的部分著（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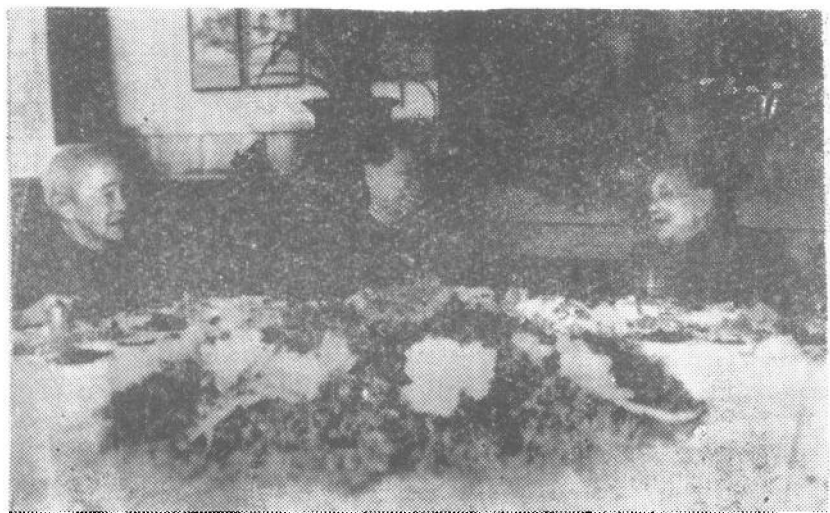
1932年12月，胡愈之和宋庆龄、鲁迅共同发起成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56年5月胡愈之率中苏友好代表团赴苏访问，图为代表团到莫斯科机场时情景。



在人大会上，胡愈之和费孝通、童弟周、华罗庚等人
接受毛泽东主席会见。



邓小平(右)、马骥(中)和胡愈之(左)在一起。

牙民：趙輝，石曾先生：

自北伐軍攻克江防，上海市民方自慶幸得獲存身，上匪軍隊下解散，不圖昨日南北，竟演空前之屠殺慘劇。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之群眾開槍，斃傷甚多，有餘人。三二八之飲，被衛隊無此種暴行，而之英國劍子手，無此兇殘，而武神聖之革命軍人，乃竟惡心出之。此次事變，報紙記載，因有所顧忌，語多不詳。弟等寓居南北，目擊其事，敢為先生等述之。

四月十二日午後一時，南北青雲路市民大會散會後，群眾擁擠，行經由寶山路。當時群眾秩序極佳，且雅有婦女童工。工會糾察隊於先一日，辭除武裝，足證是日並未攜有武器。群眾行至鴻興路口，正欲前進至此，忽有軍隊，即被隨路口之六軍第二師司令部前衛兵攔住去路。正在此時，司令部守兵即開放步槍，嗣又用機關槍向聚集寶山路之群眾，連連掃射，歷時約十五六分鐘，槍彈如雨，有五六百發。群眾因大為驚慌，不及逃避，傷者甚眾。寶山路一帶百餘丈之馬路，立時變為血海。群眾所持青天白日旗，連雲祥血，竟置諸地。傷兵自述：時行群眾倒斃路上者五六百人，而兵士則無一傷亡。事後兵士又闖入對面義品里居戶，捕得青年短衣工人，即在路上殺斃。

以上為昨日午後，弟等在寶山路所目視之實況。弟等願以人極保證，一字之虛妄。弟等尤欲證明，群眾在當時並無整齊司令部之志，軍隊南撤絕非必要，國民革命軍為人民之軍隊，為民族解放自由而奮鬥，非吾國革命史上，已有先例之地位，今乃演此慘絕人道之暴行，實為吾

人始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講，主義可以不向，若正主義人道而不顧如此，公南北之屠殺慘劇，則凡一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我三民主義，我三民主義，我三民主義之信徒，皆當為之痛心，先生等以主持正義公道，負一時物望，且又為上海政治分會委員，及上海法租界之最高責任，對於日來南北軍隊所演成之恐怖狀態，為不能起然而置之。弟等以為對於此次四一二所演，目前應有下例之措置：

(1) 國民革命軍應為軍事當局應立即走出對於此次暴行直接負責之官長兵士，但徵人民審判委員會加以裁判。

(2) 當局應保證以後不向徒手居民索財，並不予以暴力執行。

(3) 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之武裝革命軍，應立即宣告不向屠殺民眾之軍隊合作。

黨國大計，信任為端，非軍事所飲，過，惟日觀此市，就食人之慘劇，則為難為安眠。弟等誠不忍見南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此變革，而產後殘殺之餘，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殺，望先生等鑒而任之，弟注陳詞，頓祝日事成功！

鄭振鐸

馮次行

章錫珪

胡愈之

周子同

吳覺農

李石岑

同啟

四月四日

序

《胡愈之传》出版了！

这是史学界、也是文坛上的一件喜事。

胡愈老其人不同凡响，涉及的史事非同小可，他的传记问世令人高兴，催人奋进！

出版《胡愈之传》，是人们期待多年的事。听说全国有多人在动笔撰稿，本书作者朱顺佐研究员、金普森教授捷足先登，在胡愈之研究中立了首功。

胡愈之生活的90个春秋(1896—1986)，正是世界风云激荡，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年代。中华民族在沉睡中觉醒，中国文化要在世界潮流中演进，需要一批具有远见卓识、才华出众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去奋斗，胡愈之正是应时代需要而锤炼出来的杰出人才。他是社会活动家又是学者，而且是在学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是政治家，又是文化人，而且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一颗巨星；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被公认为是民主人士，又是共产党人，而且是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是名记者、名编辑，又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行政长官首任出版总署署长，还长期担负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职务，而始终不失“布衣”本质。多种多样的身份、丰富的经历、独特的风格，很难把他只放在一个固定的坐标上去评说。因此，较全面地研究他、写好他的传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又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愈老被誉为文化战线上“少有的全才”，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余太君”。“全才”指他有多方面的功绩、学识与才干，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五位于一身。他从青年时期跨入社会第一天起，到两鬓霜白的垂暮之年，始终是新闻、出版、文化界的一员。他当过编辑、记者、翻译、编审，做过主编，任过社长，从最基层的编译所的练习生，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机关的最高层的领导人，不仅有国内办报经验，又有海外办报经验。他亲手创办、发起或从事过的报刊，从30年代主编的《东方杂志》到新中国建立后主编的《光明日报》，不下二三十种之多。他一生战斗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在他的创业精神培育下的新闻出版事业的鲜花。从业时间之长、编报种类之多、政治影响之大，在同行中堪称佼佼者。说他是“全才”，还在于他知识渊博，口若悬河，与人谈话，上涉天文，下系地理，九州风云，十八朝掌故，都能滔滔不绝，应答如流，又有一枝生花之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只凭了几篇习作，就为当时商务印书馆权威看中，而被吸收进编辑所。他的文学作品文情并茂、清新俊逸，被郭沫若称为“新文学作品之一绝”。他写的通讯报道，妙语横生、饶有风趣，使人读了如临其境。他还通晓英语、法语与世界语等多种外语，翻译过西欧、东欧、东南亚等好多国家的文学、艺术、哲学、法学等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在白色恐怖严重时期，他靠翻译本领担任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中文部编辑，才得以立足上海，坐着法国特别标志的小汽车为党做秘密工作。他是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有数的几位开创者之一，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的书记，上海世界语学会会长。对愈老多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传记作了充分的阐扬。令人深思的是愈老这样的“全才”是从书店的练习生起步的，靠他在实践中锻炼，从实际生活中学习，挤业余时间读书，在社会大熔炉中成长。这条成才道路，对今天许多有

志青年来说，不论其是否受过高等学校培养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如果把愈老的成才，仅仅看作是一种纯学术、纯业务上的成就那就错了。对他来讲，贯串于言行中的，是他的人生理想、事业的追求。传记作者始终把传主放在中国革命的总背景下来描写，这是很成功的。在愈老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开头是救亡图存，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为中华的独立富强而战，后来是崇高的革命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正是正确的政治方向，使他的学术成就、业务专精始终植根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深厚土壤之中。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使他开拓了视野，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十里洋场上激烈的政治旋涡，使他擦亮了眼睛。而在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研学《资本论》原理，更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这段时间，是他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成就辉煌的黄金时期。二三十年代的胡愈之，真是全身是胆，混身是劲，勇往直前，所向披靡。1925年，胡愈之写出了4万字的长篇报道《五卅惨案纪实》，以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深刻而生动地揭露了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血腥镇压群众的罪行，驳斥了帝国主义造谣污蔑，向全世界澄清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1927年“四·一二”政变，他以凛然正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草了对国民党新军阀屠杀上海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的“抗议信”，并在上海《商报》全文发表；1931年春，胡愈之从法国经苏联，在莫斯科短暂逗留，回国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莫斯科印象记》，向中国人民真实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它像一枝春梅把春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寒凝的大地，使生活在黑暗里的中国人见到了一丝灿烂的阳光；1936年11月，他与进步记者合作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揭示了当局对救国会“七君子”的无理审判的实况，震动了中外舆论等等。这些报道与他的许多的国际政治评论，如一枝枝利箭射向黑暗势力，如一声声春雷开启了人民的

心扉。这些作品是他思想升高的步步阶梯，充分体现出他政治上的日益成熟。终于由普通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3年秋，他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关头的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他有非凡觉悟的明证。他是革命的硬骨头，被夏衍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既不怕敌人的手枪，也敢抵制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无理指责，不顾所谓“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等错误口号，坚持真理，发表团结群众、联合抗日救亡的文章，并积极联络文化界爱国人士，协助沈钧儒等建立救国会，开展爱国救亡运动。他丰富的学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使他具有沉着应变的能力，老谋深算，料事如神，成为当时救国会的核心智囊人物，被邹韬奋称为“当代诸葛亮”。

各个时代，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的理想人物，胡愈之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典范。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笔耕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称得上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格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融洽的化身，是人们高山仰止、衷心爱戴的人物。由于他不仅公德好，而且私德也好。他处理人际关系，对同志、对朋友，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诚恳谦和，善识己过；处理个人与组织关系，组织第一、集体第一、人民第一，一事当先，从不突出个人、为自己打算。与人合作共事，往往只实干，而不图虚名。这一方面固然是与他秘密党员的身份有关，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他对自己名利的淡泊所致。如《世界知识》最初实际是由他主编的。但他却不愿出面，请毕云程出面作主编和发行人，他俩合作得非常和谐。再如创办生活书店，当然邹韬奋是起了主要作用的，而愈之从建议开设书店到筹建，以及开张以后的经营，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主要谋划者之一，但他在生活书店没有职务，直到办店四年多以后，才担任了编审委员会主席。他从不张扬自己所作的贡献，因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段

历史。邹韬奋襟怀坦白，不愿埋没别人，因此在生活书店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撰写专文《我们的胡主席》特为介绍。“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评论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我们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事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亲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挚友”。又如胡乔木同志在1986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哀悼文章中指出的，“所有熟悉上海救亡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胡愈之同志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愈之同志在救国会中也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仍然默默工作，这就是愈之同志的一贯作风。”从许许多多类似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风格的高尚。

在“利”字面前，他也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非义之财分文不取，自己的正当收入，在朋友交往中慷慨好施。抗战前，他与弟弟仲持在上海法租界合租的一幢房子，楼下给复社当办事房。上海陷落后，他们的家更是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实际上成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联络点与革命干部的招待所。有时开一次饭就是好几桌，好些青年人从他们那里出发，转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对朋友、对同志他从不吝惜自己的钱财，所以常常使自己落得一贫如洗。他兄弟俩去武汉、桂林、香港以后，他们留在上海的家成了地下党重点照顾的对象。当时坚持在上海文委工作的梅益，就曾多次代表组织送钱到他们家中去。后来他到南洋办报，经常与腰缠万贯的巨富们打交道，自己又是大报主编、社长，独当一面，大权在握，能管他的党的领导又在万里之遥，在那样的条件下，如果他想为个人捞点钱，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他整天忙的是工作，常挂心的是国家大事，为个人刮民致富的事连做

梦也没有想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南洋七年多，除了与党内外同志共同奋斗，亲如家人的友谊，就是工作。紧张的、夜以继日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与兹九去南洋时是两袖清风，从南洋回来依然是清风两袖”。

更可贵的不但经受住了地下党时期的严峻考验，而且也经得起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另一种严峻的考验。1949年进入北京，他已是党与国家的高级干部。身居要位而廉洁之风不变，保持了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应有本色。住的几十年不变，仍是汪芝麻胡同那座小小的四合院，坐的仍是那辆半旧不新的“31—31508”牌照小汽车，还是那个小天井，那间既是他也是他夫人合用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真可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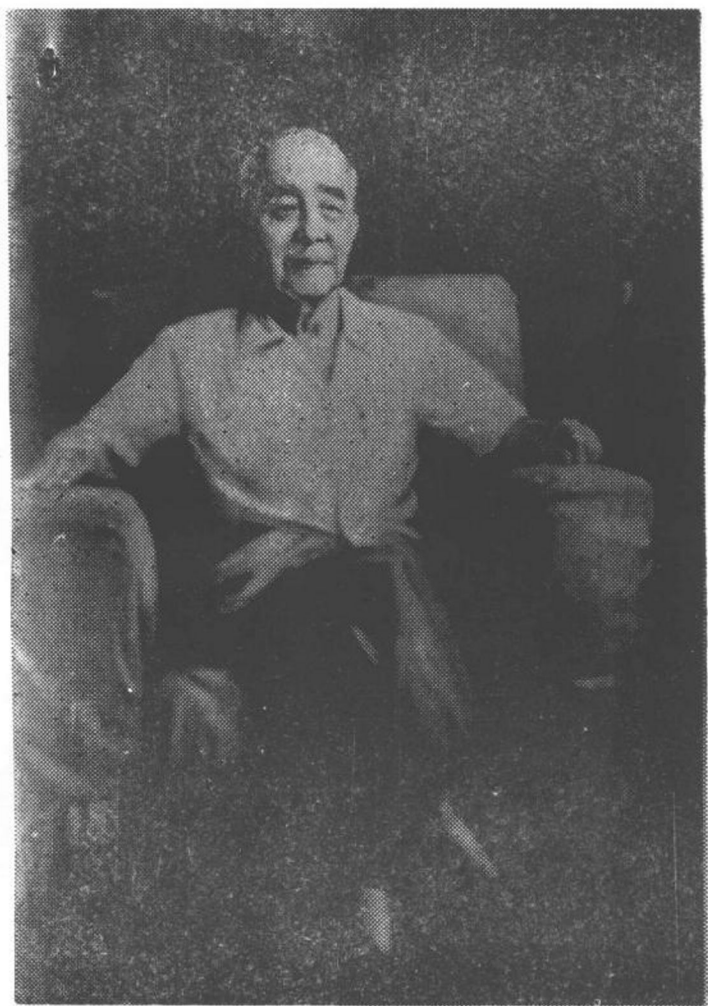
愈老的崇高品德与卓越才干，是我青少年时期心中的楷模，很早就吸引我去了解他学习他。在他生前，我已开始研究他，并发表过有关他事迹的文章。每次见到他时，我总要问这问那，向他请教。我写《蔡元培评传》、《陶行知传》等专著时，也都得到过他亲切指点。1986年初，我在北京参加他的丧礼返杭后，哀思满怀，准备写作他的传记来纪念他。然而，做这件事毕竟太难了。一、愈老横跨新旧民主革命两个时代，又经历社会主义时期近40年，史事纵横，交往纷繁，理清他的来龙去脉，实非易事；二、愈老学贯中西、文通古今、博学多才，蕴积极深，他的道德才思既不是我能企及，他的行状业绩也不是我短时所能笔述的；三、愈老在白色恐怖时期，长期从事革命秘密工作，守口如瓶，持之成性，在他身上年久遗忘、秘而不宣之事在在皆是。而在极“左”思潮猖獗之时，他精神压抑，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好些事更不肯轻易语人，大智若愚，莫测高深。有此三难使我至今只写了一些短文与传略。今由顾佐同志多年搜集史料，在与普森同志商定提纲后，写成初稿，复经普森同志的精心修改与

部分重写，集二人之智慧与勇气，用他们敏锐的思想、清新之文笔，写成洋洋 30 万 字 的宏篇巨著，做了我想干而未竟的一件大事。所以当作者要我写序言时，就欣然命笔，以记下这衷心之喜悦。两位作者，对现代史造诣很深，相信这本 内 容 丰 富、立论正确的《胡愈之传》必将引起各界的重视。愈老的人格品性，一定会唤起为振兴中华而拚搏的人们心灵的共鸣，一定会启示人们特别是青年蓬勃向上，又红又专，强身坚志，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而勇攀科学与道德高峰。这部传记的出版也必将推动胡愈之研究的深入发展。

胡国枢

1991年11月7日

于杭州



胡愈之画像